

“强社会”对抗“弱国家”

——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的兴落及其影响*

韩志斌 谢宇科

内容提要 多元、破碎的部落社会与孱弱的新生民族国家,塑造了利比亚典型的“强社会——弱国家”结构体系。“强社会”对抗“弱国家”成为影响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成败的主要因素。赛努西君主制政权未能给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留下有益的历史遗产。卡扎菲执政后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整合未达到预期效果,转而发动民众革命。卡扎菲主要使用分化、拉拢的手段治理利比亚部落社会,围绕去制度化的民众国体制、威权统治、地租经济以及部落政治文化改造建构“强国家”,但最终失败而告终。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卡扎菲政权未能破解“弱国家”治理“强社会”的困局,反而造成“强社会”对抗“弱国家”的态势。由于“强社会”对抗“弱国家”的国家底色,利比亚距离实现长治久安且稳定的国家建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键词 利比亚 伊斯兰社会主义 国家建构 强社会 弱国家

国家建构^①是困扰利比亚政治发展的关键问题。无论是伊德里斯君主制民族主义的王朝统治,还是卡扎菲伊斯兰社会主义^②的国家治理,都未能完成利比亚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使命。自2011年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政权轰然倒台以来,利比亚分裂为东、西两个政权,中央权威缺失成为国家重建的症结所在,反映了利比亚“强社会”对抗“弱国家”的历史惯性。^③利比亚是大国博弈和“联合国制造”的产物。^④国家建构的先天不足和外源性特征,使得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缺乏对本土社会的适应基础,因而高度重视通过政治动员获取政治合法性。^⑤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强社会”(部落社会)对抗“弱国家”(民族国家),卡扎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3年度重大项目“中东史学通史(五卷本)”(23VLS027)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民族》编辑和外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建议,作者文责自负。

① “国家建构”指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主要涉及“国家政治结构、制度、法律的建设,包括行政资源的整合和集中,使国家能够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实施统一的行政控制”,以及“国家树立政治权威、自上而下向整个社会渗透国家权力、建立现代政治体系”。广义上的国家建构也包括建构共同的政治—文化共同体,特别是国家认同的建构。参见田文林:《民族主义视角中的国家建构过程——以后殖民时代的阿拉伯国家为例》,载《世界民族》,2009年第3期;王建娥:《族际政治:20世纪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9页。

② “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指卡扎菲在利比亚执政时期推行的意识形态及其指导下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实践。参见韩志斌等:《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页。

③ 本文沿用米格代尔的定义,“弱国家”指国家社会关系中国家能力不足的国家。“强社会”则是相对的概念,指社会控制能力强并使国家无力渗透、动员和变革的社会。参见Joel S. Migdal, *State in Society: Studying How States and Societies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48–49, 53–55。

④ 参见韩志斌:《地缘政治、民族主义与利比亚国家构建》,载《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

⑤ Mostafa Rejai and Cynthia H. Enloe, “Nation-States and State-N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3, no. 2, 1969, p. 155.

菲政权未能平衡国家政治动员与政权社会基础之间的矛盾,失去了自我革新的能力。

国内外学界尚未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系统探讨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深层根源。国外学界聚焦如下问题:一是利比亚的部落主义问题。丽萨·安德森认为,卡扎菲政权陷入部落政治怪圈,在增强政治合法性时大量借助了部落组织与部落话语。^①二是利比亚地租经济形态及其影响研究。德克·范德瓦勒认为,石油发现使利比亚成为典型的食利国家,阻碍利比亚构建现代国家必需的制度建设和监管能力。^②三是利比亚威权统治研究。德克·范德瓦勒认为,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和伊斯兰社会主义政权都陷入威权统治窠臼,没能在利比亚内部利益竞争的混乱中建构一个现代国家。^③四是利比亚外交与大国博弈。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认为,美国的援助和军事基地导致伊德里斯王朝失去政治合法性。^④国内学界主要关注利比亚国家构建、部落政治模式、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和现代化以及国家重建等问题。^⑤

本文利用英、美档案梳理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进程中“强社会”和“弱国家”的博弈历程,阐释其国家建构失败的深层困境和现实影响。

一、“强社会”塑造“弱国家”: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的基础

历史上,利比亚由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组成,各有其独特的社会发展轨迹。利比亚多元、破碎的社会结构以及国家实现独立的特殊历程决定了利比亚国家建构的基本特征。

(一) 利比亚历史上形成多元、破碎的“强社会”,塑造其国家建构的底色

1835 年,奥斯曼帝国第二次占领利比亚并建立摄政区,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是统治重心,昔兰尼加和费赞则处于自治地位。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奥斯曼帝国推行坦齐马特改革,通过土地和农业改革推动定居农业。^⑥正如阿里·艾哈迈德指出:“到 20 世纪初,(的黎波里塔尼亚)旧的朝贡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这是奥斯曼帝国国家改革和欧洲资本主义直接渗透的结果。”^⑦早在意大利殖民者到来前,利比亚各省历史发展道路不同,相互差异极大,部落社会状况复杂多元。昔兰尼加和费赞的经济结构以半游牧为主,昔兰尼加的赛努西教团凭借其信仰纽带为当地部落提供公共服务,建立了半独立的酋邦国,庇护境内的跨撒哈拉贸易商队并从中获取丰厚收入。费赞位于的黎波里塔尼亚深入非洲的关键通道,依赖跨撒哈拉贸易提供的“租金”。随着跨撒哈拉贸易的衰落,

① Lisa Anderson, “Tribe and State: Libyan Anomalies”, in Philip S. Khoury and Joseph Kostiner (eds.), *Tribe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② Dirk Vandewalle, *Libya Since Independence: Oil and State Building*,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③ Ruth First, *Libya: The Elusive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4;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④ Ronald Bruce St. John, *Liby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wo Centuries of Strif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2; Lisa Anderson, “They Defeated Us All: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Local Politics, and Contested Sovereignty in Libya”,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71, no. 2, Spring 2017.

⑤ 参见韩志斌等:《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利比亚史》,商务印书馆,2022 年;全菲:《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兴衰及教训》,载《北京社会科学》,2022 年第 12 期;韩志斌:《地缘政治、民族主义与利比亚国家构建》,载《历史研究》,2014 年第 4 期;韩志斌:《卡扎菲构建“阿拉伯地区安全复合体”评析》,载《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 年第 1 期;韩志斌:《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年;韩志斌:《利比亚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载《世界历史》,2008 年第 2 期;韩志斌:《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与国家现代化》,载《世界民族》,2009 年第 3 期;韩志斌:《从革命民族主义到超越民族主义——利比亚现代化的跃迁》,载《西亚非洲》,2009 年第 12 期;闫伟、韩志斌:《部落政治与利比亚民族国家重构》,载《西亚非洲》,2013 年第 2 期,等等。

⑥ Lisa Anderson, *The Stat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unisia and Libya, 1830 - 198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08 - 113.

⑦ Ali Abdullatif Ahmida, *The Making of Modern Libya: State Formation, Colonization and Resistance, 1830 - 1932*,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9, p. 61.

费赞地区经济逐渐萧条。

独立后的利比亚仍处于碎片化的部落社会阶段,传统农业是国家经济支柱。国家主要出口产品是战场遗留的废弃金属、初级农产品和手工制品,属于典型的贫困国家。^①从人口构成看,独立前利比亚人口大约为110万,城市居民仅占1/5左右,大部分人口是定居农村或半游牧的部落民。^②城市外的广大农村和内陆荒漠是部落高度自治的世界,城市则是由传统的官员、商人和大地主阶层把持。国家所代表的中央权威与长期奉行自治传统的利比亚社会缺乏足够的联系,后者拥有自主的治理机制和强大的基层组织。

(二) 国家独立的特殊历程使利比亚成为典型的“弱国家”

第一,利比亚缺乏国家建构的历史遗产,历史上从未被整合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1911年意大利入侵利比亚,只是形式上统一了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三个省份,并沿用旧称将前两者整合为利比亚。利比亚人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宗教民族主义的驱动下反抗西方殖民者,产生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思想意识。第二,二战后利比亚内部缺乏推动国家统一的核心力量。1943年北非战役结束后,英、法占领利比亚三省。伊德里斯凭借赛努西运动的历史影响力基本统一了昔兰尼加,的黎波里塔尼亚则陷入内部派系斗争。1949年6月1日,昔兰尼加宣布拥戴伊德里斯为国王,建立埃米尔国。9月18日,英国开始退出利比亚,的黎波里塔尼亚接受昔兰尼加的君主制建国方案。利比亚独立在某种程度上“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遗产之间不情愿的伙伴关系的产物”^③。第三,利比亚独立进程深受域外大国博弈的影响。^④1949年11月2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利比亚独立决议,英、美两国转向支持利比亚建立联邦制,最终建立了亲西方的伊德里斯王朝。英、美通过伊德里斯王朝保护西方国家在利比亚的利益,特别是在利比亚的军事基地。

(三) “强社会”压力下的仓促独立迫使伊德里斯王朝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搭建了“弱国家”的基本架构

利比亚缺乏建立统一国家的历史经验,自上而下增强国家控制能力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作为保障。利比亚筹备独立时间有限(自1949年11月底至1951年12月24日),不同省份发展差异带来的冲突,争取独立摆脱大国托管的迫切性,以及联邦制和集权制两种建国方案之争限制了利比亚国家的整合空间。^⑤伊德里斯王朝在妥协中仿照西方国家建立了杂糅的制度体系。其主要内容是松散的联邦制、多重司法体系的三权分立制和模糊的君主制。^⑥仓促建立的制度舶来品支撑伊德里斯王朝搭建国家基本框架,具有明显的模糊性和妥协性。联邦政府名义上承担了国家发展重任却高度依赖地方政府配合,结果陷入有名无实的境地。利比亚君主制政权治下的地方政府对于联邦政府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无论涉及的事务是否完全由联邦政府管辖。^⑦

利比亚“弱国家”的中央权威受到王室和地方政府双重挤压。新生政权将现有的精英群体纳

① Benjamin Higgins, “Entrepreneurship in Libya”,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11, no. 3 (Summer, 1957), p. 319.

② United Nations Technical Assistance Administration, *A General Economic Appraisal of Libya*, ST/T AA/K/Libya/1, New York, 1952, p. 6.

③ Jacques Roumani, “From Republic to Jamahiriya: Libya’s Search for Political Community”, *Middle East Journal*, Spring, 1983, vol. 37, no. 2 (Spring, 1983), p. 163.

④ 韩志斌:《地缘政治、民族主义与利比亚国家构建》,载《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

⑤ 韩志斌:《利比亚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载《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

⑥ Majid Khadduri, *Modern Libya: A Study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Baltimore: John Hopkins Press, 1963, pp. 185–205.

⑦ FO 540/3, *Libya: Annual Report For 1952*, January 2, 1953, Adam Matthew Digital, p. 2.

入从殖民时代继承下来的恩庇网络来维持统治,通过分配国家资源给社会精英换取后者的支持。^①伊德里斯王朝未能触及利比亚多元、破碎的部落社会结构,其统治依赖传统的社会精英支持,从而形成了松散的政治结构和弱势的联邦政府。此外,国家与社会的相对隔离则使利比亚社会对新生国家的态度冷漠,国家缺乏社会的普遍支持,难以获得政治合法性和政治认同。美国首任驻利比亚公使维拉德(Henry Serrano Villard)在利比亚独立后便怀疑利比亚民众能否理解新国家带来的变化。^②美国驻开罗大使卡弗里(Caffery)也观察道:“人们对新政府没有兴趣,大多数官员认为他们在政府的工作只是兼职。议会在下午 5 点议员们下班后才开会。”^③换言之,作为舶来品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能否渗入利比亚社会肌理,高度依赖伊德里斯王朝的自觉建构,伊德里斯王朝却依赖传统部落力量支持,无法革新自身,建立现代国家制度体系。^④

总而言之,破碎、多元的部落社会与孱弱新生的民族国家共同塑造了利比亚“强社会”——“弱国家”的结构体系。伊德里斯王朝统治基础薄弱,依赖传统的部落、城市精英支持,纵容后者肆意腐败。伊德里斯王朝因此难以吸纳新兴阶层、推动国家改革,致使伊德里斯王朝的国家建构迟滞于经济、社会发展,最终被卡扎菲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开启了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的新征程。

二、构建“强国家”“弱社会”: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的多重路径

按照艾森斯塔德的观点,国家为扩大其能力进行的政治动员,在理论上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接受新的社会行为模式并被纳入一个共同的制度与组织框架之中。^⑤这个过程能否顺利进行,受制于政权自身利益考量和政权的社会基础,政权既有可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阻碍国家建构,也可能因自身“势单力薄”无法实现国家建构的雄心。^⑥卡扎菲治下的利比亚便是如此。“强社会”对抗“弱国家”,构成了影响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成败的核心逻辑。

(一) 动员民众革命

1969 年 9 月 1 日,以卡扎菲为首的利比亚“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伊德里斯王朝,这是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的逻辑起点。年轻的革命者们夺取政权后建立了革命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革指会),卡扎菲成为革命领袖和国家元首。^⑦1969 年 12 月 11 日,革指会废除伊德里斯王朝宪法,发布带有宪法性质的《临时宪法宣言》。^⑧

卡扎菲试图通过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巩固政权,自上而下地推动国家建构。1971 年 6 月 12

^① Stein Sundstøl Eriksen and Kristen Nordhaug,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in the Making of Weak and Strong States”, *Forum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2006, vol. 33, no. 2, p. 242.

^② Henry Serrano Villard, *Libya: The New Arab Kingdom of North Afri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54.

^③ FRUS, 1952–1954, *Africa and South Asia*, vol. 11, Part 1, pp. 130–131.

^④ 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的政治权力主要由传统政治精英把持,后者主要由大型部落和城市家族组成。国王伊德里斯一般根据部落出身、个人忠诚和地域平衡来选择大臣,并通过不时轮换以确保传统政治精英在政府中拥有充分主导权。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o. 36.5–65 entitled: “Libya”, *U. 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USDDO), CK2349666080, Gale Group, 22 April 1965, p. 2.

^⑤ [以]S. N. 艾森斯塔德著,张旅平等译:《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2—13 页。

^⑥ Stein Sundstøl Eriksen and Kristen Nordhaug,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in the Making of Weak and Strong States”, *Forum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33, no. 2, 2006, pp. 240–241.

^⑦ 卡扎菲认为推翻君主制政权是利比亚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革命的开始,而不是一场政变。韩志斌、李铁:《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与国家现代化》,载《世界民族》,2009 年第 3 期。

^⑧ 《临时宪法宣言》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将利比亚革命的目标概括为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二是确立利比亚制度框架:利比亚革命政权继承君主制时期政府架构,设立内阁并由革指会任命总理和其他部长,革指会掌握军队和国家实权。Ronald Bruce St. John, *Libya: Continuity and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2015, pp. 52–53.

日,卡扎菲仿照埃及建立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动员利比亚社会各阶层支持伊斯兰社会主义。1972年5月30日,革指会颁布第71号法令规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是利比亚唯一的合法政治组织,禁止政党活动。然而,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由于缺乏干部储备,无法实现革指会的宏图,沦为革指会和地方政府的附属机构。^①卡扎菲取缔政党政治却无法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其国家建构遭遇严重挫折。究其原因,革指会自身缺乏社会基础,缺少治国理政经验,也未能获取足够的支持来发动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变革。

为打破僵局,卡扎菲发动“民众革命”,更广泛地动员利比亚民众的政治参与,但成效有限。一方面,民众革命在实践中没有摆脱“新瓶装旧酒”的桎梏。卡扎菲民众革命的核心是建立“人民委员会”,自下而上地实现民众与国家的直接联系。但是,大多数人民委员会代表并不是治国专家,缺少管理政府和社会组织的专业知识,结果是要么将原有管理层纳入人民委员会,要么坚持己见导致工作效率降低。^②另一方面,民众革命影响难以直接渗入利比亚广大农村和部落的“强社会”地区。鉴于旧政权与部落的紧密联系,卡扎菲一度重视对部落社会的整合。^③但是,卡扎菲整合部落社会未能取得预期效果。政府任命的地方行政人员很难获得农村和部落地区民众的信任和支持。事实上,大部分部落谢赫虽然倾向于反对变革,但他们并不拒绝政府在农村和部落地区提供公共服务。^④利比亚部落社会与民众革命并非截然对立。由此观之,如何处理现实的国家建构与变化中的传统部落社会的关系,是卡扎菲推动民众革命、深化政治动员的关键。

(二) 构建以民众国体制和二元政治结构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

自石油发现以来,利比亚部落社会发生剧变,但是传统的社会共同体很快适应了这种变化。首先,部落的游牧属性弱化,政治作用增强。其主要原因是:部落逐渐抛弃落后的传统农业,^⑤大规模涌向城市,转型为“社区部落”,^⑥部落的血缘纽带和认同归属没有被利比亚的城市化和不发达的工业化消解。其次,利比亚发现石油后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加上吸纳城市移民的治理能力不足,部落自组织的社会网络和动员能力极具吸引力。^⑦正如丽萨·安德森所说,(利比亚)传统组织比稀疏社会具有更多的优势。^⑧最后,利比亚的石油分配制度高度腐败,工业化局限在碳氢领域,部落并未分裂为单个家庭。在某种程度上,只要利比亚的石油收入分配仍主要基于裙带关系,维持部落纽带就是有利可图的选择。1975年,革指会内部发生政变。^⑨此后,卡扎菲任命其亲属和部落成员接管

① Omar I. El Fathaly and Monte Palmer,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in Libya*, Massachusetts: Lexington Books, 1980, p. 100.

② “Popular Committees – Escalation of Revolution”, in *FCO/93/349 Internal Political Situation in Libya*, Adam Matthew Digital, 12 September 1974, pp. 1–2.

③ 主要内容是:一方面打破“同心圆式”的部落结构,用新的行政区划分割传统部落边界;另一方面任命新的地方行政人员,搭建部落民众与国家间桥梁,从而动员部落民众支持卡扎菲革命。John Wight, *Libya: A Modern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22, p. 179; 闫伟、韩志斌:《部落政治与利比亚民族国家重构》,载《西亚非洲》,2013年第2期。

④ Omar I. El Fathaly and Monte Palmer, “Opposition to Change in Rural Liby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1, no. 2, April 1980, p. 248, 259–260.

⑤ 利比亚人向城市移民的主要原因是农业收入远低于城市地区的工资,导致利比亚许多地区的农田荒芜,城市中心拥挤不堪。J. A. Allan and K. S. McLachlan, *Libya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2015, p. 10.

⑥ Wolfram Lacher, “Families, Tribes and Cities in the Libyan Revolution”, *Middle East Policy*, vol. 18, no. 4, Winter 2011, p. 146.

⑦ 谢宇科、韩志斌:《从君主制民族主义到伊斯兰社会主义——利比亚式现代化的流变与特征》,载《中国非洲学刊》,2023年第4期。

⑧ [美]菲利普·库里、[以]约瑟夫·克丝缇娜主编,韩志斌等译:《中东部落与国家形成》,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334页。

⑨ 1975年8月13日革指会两名成员,利比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秘书长巴希尔·哈瓦迪(Beshir Hawwadi)与计划部部长奥马尔·穆海希(Umar Muhayshi)带头发动政变,以失败告终。卡扎菲粉碎政变后清洗军队,并把革指会成员缩减至5人。1977年革指会被人民大会所取代,但是革指会成员依旧把持国家的关键职位。Ronald Bruce St. John,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Libya*, Lanham: Scarecrow Press, 2006, p. 106; [美]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著,韩志斌译:《利比亚史》,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142页。

情报和安全部门。卡扎菲政权为了巩固统治基础,继续推动民众革命,并开始重视传统的社会共同体提供的助力。具体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的核心是直接民主的民众国体制。1976 年 9 月,卡扎菲出版《绿皮书》,系统阐释其拒绝政党政治和议会代表制的原因,认为直接民主制是民主的唯一解决方案,并描绘了以直接民主建构民众国体制的蓝图。^①卡扎菲建立了民众国的雏形机构,^②并于 1977 年 3 月 2 日发表《人民权威宣言》,明确了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的基本框架^③。民众国体制以协商和选举机制取代国家法律制度体系,核心特征是去制度化。利比亚国家机构的权利、义务、职责范围等核心属性仅由卡扎菲的个人意志与《绿皮书》大致确认,既没有最基本的宪法也没有系统的成文法明确地厘清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具有高度的模糊性和随意性。

卡扎菲建构去制度化的民众国体制,是试图分化和治理利比亚“强社会”的核心举措。一方面,卡扎菲默认地方自治传统,创造民众国体制吸纳社会各阶层支持国家政权。民众国将国家的大部分职能付诸直接民主制,又以卡扎菲为国家中央,建立了广泛但分化的国家机构: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各级人民大会,作为行政机关的各级人民委员会,以及代表专业人士、知识分子的专业工会等。原则上,利比亚基层地区自治,不受中央权力的制约,并拥有自己的委员会体系;基层人民大会的意见传递到国家一级,形成各部委决策的基础。^④利比亚乡村、城市的人民大会与人民委员会自行组成地方行政机构,通过调解和协商的方式实现自组织的治理。用卡扎菲的话说,“社会把自己组织在基层人民大会之中”^⑤。另一方面,去制度化的直接民主制强化了部落组织的社会治理能力,不利于国家深化社会整合。在内陆地区,利比亚部落不借助政府实现社会治理,依靠血缘纽带组织的传统生活方式未发生根本变革。^⑥在城镇,部落社区直接影响基层人民大会的选举。部落仍是利比亚极具生命力的基层组织,构成可供卡扎菲拉拢的重要社会力量。

二是卡扎菲个人威权统治成为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的目标。以革命委员会为代表的非正式权力机构对抗正式国家机构,充当卡扎菲加强政治动员的威权统治工具。卡扎菲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最初原因是为了解决“强社会”对抗“弱国家”问题:群众革命热情不足,传统部落社会精英影响力依旧强大,以及许多基层人民大会的地区本位主义。^⑦1976 年 5 月 25 日,卡扎菲宣布要建立特别委员会加强利比亚革命。^⑧1979 年 3 月,卡扎菲建构了伊斯兰社会主义的二元政治结构,即以人民大会和人民委员会构成的正式国家机构和以革命委员会为代表的非正式权力机构,卡扎菲称之为“行政权威”与“革命权威”分离。^⑨由于革命委员会的制度缺失及其权力来源与社会脱节,革命委员会最终异化为卡扎菲个人威权统治的延伸,沦为卡扎菲制约正式国家机构、监督民众的工

① [利比亚]穆阿迈尔·卡扎菲著:《绿皮书》,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年,第 37-41 页。

② 即 1975 年 9 月建立基层人民大会,1976 年 1 月成立总人民大会,同时解散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

③ “人民权威宣言”主要内容有:宣布建立民众国、“民众时代”到来,利比亚国名改名为“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古兰经是民众国宪法,人民通过人民大会、人民委员会、专业工会行使权力等。

④ Dirk Vandewalle, *Libya Since Independence: Oil and State Building*,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95.

⑤ [利比亚]穆阿迈尔·卡扎菲著:《绿皮书》,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年,第 49 页。

⑥ John Davis, *Libyan Politics: Tribe and Revolution, An account of the Zuwaya and Their Government*, London: I. B. Tauris & Co Ltd, 1987, pp. 41-43.

⑦ Omar I. El Fathaly and Monte Palmer,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in Libya*, Massachusetts: Lexington Books, 1980, pp. 197-198.

⑧ 1977 年 11 月首个革命委员会成立,1978 年革命委员会向全国扩散,1979 年 3 月后革命委员会扩散至全国各阶层。Dirk Vandewalle (ed.), *Qadhafi's Libya, 1969-1994*,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p. 92.

⑨ Ronald Bruce St. John, *Libya: Continuity and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2015, p. 48; Ruth First, *Libya: The Elusive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4, pp. 61-62.

具。可以说,卡扎菲利用了利比亚社会多元、破碎的结构特点,试图借助正式的民众国体制分化、动员社会各阶层,又依靠非正式权力机构拉拢特定群体,维护个人威权主义,尽管这种控制力难以深入社会基层。

三是石油资源国有化和分配型地租经济形态奠定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制约了国家建构的深化。在1970—1974年期间,卡扎菲基本实现了利比亚石油资源的国有化,石油收入大幅增长。^①石油国有化是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庞大支出的根本保证,卡扎菲试图通过地租收入和大规模福利措施“收买”利比亚人民。1978年9月1日,卡扎菲宣布取缔私有经济实行全面国有化。^②全面国有化和直接民主制至少在原则上让利比亚人民参与国民经济的管理,有效地支撑起民众国制度的物质基础。然而,政治导向性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使得利比亚经济呈现典型的分配型特征,即善于再分配利润而不是促进再生产^③。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不通过建构税收体系向社会汲取收入,客观上缺少建构强力国家制度体系的动力。

四是卡扎菲的国家认同建构依赖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部落政治文化,后者最终成为主流。一方面,卡扎菲高举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思想旗帜。在国内,卡扎菲反复强调利比亚独特的文化特征,尤其强调利比亚的民族尊严遭受西方国家的侮辱,以此来构建民族凝聚力。^④在国际上,卡扎菲自诩为推动阿拉伯国家统一的先锋,却徘徊于国家民族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之间,与多个阿拉伯国家甚至周边国家交恶。^⑤另一方面,卡扎菲从部落政治文化获取政治合法性。《绿皮书》是如此阐释卡扎菲设想中的部落与民族关系:“对个人来说,家庭比国家更为重要”;“部落是繁衍和扩大后的家庭,民族是繁衍和扩大后的部落”。^⑥在卡扎菲眼中,部落是“一所社会学校和天然的社会保护伞”,在团结互利方面胜于民族,并作为一个社会的物质整体存在下去。^⑦换言之,卡扎菲认为尽管部落主义不利于民族团结,但是部落社会的传统纽带值得信赖。卡扎菲在某种意义上把利比亚现代民族国家视为一个广义的部落集合。20世纪70年代末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退潮,卡扎菲为维持个人权威只能更为依赖部落的认同纽带提供支持。随着20世纪80年代国际石油价格下跌,利比亚经济发展受挫,卡扎菲建立在政绩基础之上的民族主义动员难以为继,部落主义的实用地位上升。80年代中期利比亚国内对卡扎菲统治愈发不满,出现公开反对政权统治的迹象。^⑧

(三)徘徊在“强社会”与“弱国家”之间

20世纪80年代后,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逐渐等同于卡扎菲的个人威权统治。尽管卡扎菲试图构建一个“强国家”,但政权更为依赖“强社会”的主体——部落力量来维持统治。部落主义成为卡扎菲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支柱。由于卡扎菲国家建构的渗透性和整合力薄弱,家庭和部落关系仍然在国家治理中深刻影响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早在20世纪70年代的地方治理中,部落组织就已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当地行政,“我们部落的儿子”和“我们村庄的儿子”之类的选举口号屡见不鲜。^⑨1994年7月,卡扎菲宣布成立了由部落首领、族长和当地重要人士组成的人民社会

① 韩志斌:《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0—121页。

② John Wight, *Libya: A Modern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22, pp. 264–265.

③ [美]道格拉斯·C. 诺思著,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格致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④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23.

⑤ 韩志斌:《地缘政治、民族主义与利比亚国家构建》,载《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

⑥ [利比亚]穆阿迈尔·卡扎菲著:《绿皮书》,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99、103页。

⑦ [利比亚]穆阿迈尔·卡扎菲著:《绿皮书》,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104—106页。

⑧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28.

⑨ Dirk Vandewalle (ed.), *Libya since 1969: Qadhafi's Revolution Revisite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71.

领导委员会(People's Social Leadership Committee)。^①在随后的两年里,全国各地成立人民社会领导委员会。卡扎菲赋予人民社会领导委员会的职能是防止家庭和部落成员反对政权,维持社会稳定,负责分配国家补贴和颁布法律文件。^②1996 年 3 月,卡扎菲召开人民社会领导委员会全国大会。此后,卡扎菲经常在人民社会领导委员会大会讨论国内政治问题,争取政策支持。^③人民社会领导委员会的建立和扩张,是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将部落组织上升至准国家机构,构成卡扎菲转向部落支持的正式开端。卡扎菲还将部落设计为监督、控制反对力量的重要组织。^④

随着 1999 年 4 月卡扎菲交出洛克比空难嫌疑人以及 2003 年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际社会逐渐取消对利比亚的制裁,利比亚与西方国家关系逐步回暖。尽管利比亚重新融入国际社会,但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事实上已丧失深化改革的能力,国家建构陷入了僵局。2003 年后,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弱国家”面临三大主要困难。首先是经济发展滞后。利比亚臃肿的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无法满足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就业需求,据估计,利比亚 80% 的劳动力受雇于公共部门,但青年的失业率高达 48.7%。^⑤其次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加大。全面实行国有化后,利比亚民众国的社会阶层分化主要源于国家财富的配置、支出差异,与卡扎菲的关系亲疏几乎等同于财富多寡。最后是卡扎菲威权统治成为国家发展的掣肘,利比亚失去国家改革的能力。2006 年,一度主持利比亚经济改革的总理苏卡利·加尼姆(Shukri Ghanem)被迫下台,其私有化改革随之搁浅。此后,利比亚的改革反而催生更多的新商业寡头,试图垄断国家经济。^⑥

综上,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建构了一个围绕卡扎菲威权统治的狭隘的政治体系,一个看似垄断了国家经济运行实则能力低下的民众国,任何深入的改革都将不可避免地触及政治改革。可以说,国家建构的缺失最终拖垮了利比亚国家发展进程。因此,“阿拉伯之春”的示范效应很快在利比亚引发动荡。2011 年 2 月 16 日,利比亚东部地区第一大城市班加西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游行。抗议浪潮迅速传递至其他城市,卡扎菲依仗的军队出现大规模溃逃的现象,^⑦东部地区以惊人的速度改旗易帜。到了 2 月底,利比亚东部大部分地区已落入反对派手中,后者成立了新政权全国过渡委员会(National Transitional Council)。随着 3 月 19 日北约干预利比亚,卡扎菲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沦为孤家寡人,于 10 月 20 日兵败身死,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以失败而告终。

三、“强社会”对抗“弱国家”: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失败的根源与影响

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失败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家与社会关系失衡是主要原因:经济发展滞后,政权依赖部落支持加剧了国家建构的困难,国家建构内核缺失等其他因

① Ronald Bruce St. John, *Libya: Continuity and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2015, p. 71.

② Dirk Vandewalle (ed.), *Libya since 1969: Qadhafi's Revolution Revisite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68 - 69.

③ Ronald Bruce St. John, *Libya: Continuity and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2015, p. 72.

④ 1997 年 3 月卡扎菲颁布了一项部落集体惩罚法,规定任何隐瞒、同情或未能交出罪犯的人都将被视为“参与了集体犯罪,需要实施集体惩罚”,而惩罚是剥夺整个家庭或部落的公共服务,例如切断供水或供电。Alison Pargeter, *Libya: The Rise and Fall of Qaddafi*,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69.

⑤ Jean Louis and Romanet Perroux, “The Deep Roots of Libya's Security Fragmentatio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2019, vol. 55, no. 2, pp. 208 - 209.

⑥ Alison Pargeter, *Libya: the Rise and Fall of Qaddafi*,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97 - 198.

⑦ Florence Gaub, “The Libyan Armed Forces between Coup-proofing and Repression”,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013, vol. 36, no. 2, pp. 235 - 236.

素则加速了卡扎菲国家建构的僵化,最终导致政权更迭。卡扎菲试图用“弱国家”治理“强社会”,反而造成“强社会”对抗“弱国家”。

第一,利比亚国家建构未能克服“强社会”对抗“弱国家”的两难困境。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政权在社会基础薄弱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广泛的政治动员来增强自身并建构新兴国家,但这个过程又对政权原有的统治基础和政权自身安全产生威胁。卡扎菲执政初期通过全面政治动员砸碎旧制度的束缚,试图实现政权基础和政治合法性的广泛扩展。但由于卡扎菲的威权倾向和内部政策矛盾,1975年革指会内部政变后,卡扎菲转向建构个人威权统治保障政权安全。此后,卡扎菲建构了去制度化的民众国体制和加剧国家内部冲突的二元政治结构,本质上是卡扎菲政权拒绝个人权力受到约束,从而转向了徒有其表的政治动员。可以说,卡扎菲政权选择了民粹主义和去制度化的威权统治模式,政权的安全利益与建构现代国家的要求出现根本性矛盾。卡扎菲为了维持统治拒绝增强国家能力,将国家治理付诸简单的协商和选举机制,又难以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政治体系中推动改革来应对危机,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便趋于停滞。

第二,西方殖民者埋下祸根,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基础薄弱。利比亚饱受西方殖民主义侵害,意大利殖民者打断了利比亚各省多元发展的历史轨道,英国占领后也未能跨越地区边界建立可靠的国家机构。利比亚社会呈现出多元、破碎的结构特征,而中央集权的国家极为弱势。正如伯纳德·刘易斯所言:西方帝国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东奉行的是“没有责任的干涉帝国主义,既不会建立也不会允许一个稳定和有序政府(存在)”^①。伊德里斯王朝依赖地方“强人”的支持建立寡头统治,加上自身合法性不足,结果是以部落和城市家族为代表的地方势力组成了一个隐形的“强社会”。伊德里斯王朝不仅未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而且依赖通过妥协和分配国家资源换取社会支持的恩庇体系,国家机构沦为分配石油财富的分肥场所,缺乏自我革新能力。君主制政权因而未能给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留下有益的遗产。

第三,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失去了国民经济治理能力,经济发展滞后且腐败盛行。卡扎菲建构了几乎掌控国民经济全领域的分配型经济体,但没有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机构和官僚队伍,效率低下、奢侈浪费、资源配置不合理等现象十分突出。^②此外,利比亚私有经济几乎被废除,经济发展依靠碳氢工业,国民收入与国际油价高度挂钩,致使利比亚经济的抗风险能力非常低下。在1982—1986年间,利比亚石油收入从210亿美元下降到54亿美元,迫使卡扎菲在1987年开启了实质是改良主义的自由化、私有化改革。^③此外,利比亚产业结构严重失衡,轻工业发展落后,民生用品供应不足。^④更糟糕的是,利比亚地租经济体与卡扎菲威权统治结合产生了结构性的腐败,阻遏国家经济改革。卡扎菲还公开奉行家族政治,安排其子女涉足利比亚各重要领域,衍生出更为腐败的特权网络。简而言之,利比亚国家建构缺失对其经济发展造成长远的负面影响,但被短暂的高油价所带来的繁荣一度掩盖了。在利比亚国家建构基础薄弱的前提下,汹涌的石油收入阻碍而非促进利比亚的国家建构。

第四,部落填补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的空缺,反而使利比亚国家建构更为困难。从利比亚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看,代表中央集权的国家始终未能实现社会整合,部落社会传统的地区治理模式和认同观念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一方面,利比亚部落社会较为分裂,部落传统倾向于拒绝中央政府的权威。从部落类型看,利比亚属于平等型部落。其特点是各部落地位平等,部落首领权

① Bernard Lewis,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es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59.

② Dirk Vandewalle (ed.), *Libya since 1969: Qadhafi's Revolution Revisite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235–236.

③ Dirk Vandewalle, *Libya since Independence: Oil and State Building*,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84.

④ Dirk Vandewalle, *Libya since Independence: Oil and State Building*,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144–145.

力有限,主要扮演调解人角色;部落之间主要通过达成共识而不是强制命令来维持内部秩序。^①平等型部落社会具有鲜明的分裂性。利比亚各部落之间各自为政,甚至互相攻伐,加上地广人稀的地理条件,以及长期自治的社会治理传统,利比亚的部落社会呈现结构破碎和抗拒国家的独特性。另一方面,部落所代表的基层自治组织形式、文化认同归属乃至传统行为模式都与建构现代国家的目标存在一定矛盾。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组织形式带有强烈的排他性和宗派主义色彩,^②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国家制度功效和公民身份认同。部落充当了卡扎菲国家建构滞后的“替代品”,而卡扎菲为拉拢特定部落也不惜牺牲集体利益。民众国“弱国家”的国家治理缺陷被利比亚部落与国家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扩大,国家内部矛盾因此更加难以解决。

第五,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国家认同建构欠缺持续性和包容性,卡扎菲向部落政治文化妥协最终损害了国家层面的共同体认同。在卡扎菲执政初期,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一度以富有激情的“革命民族主义”建构国家内核。卡扎菲革命赶走了残留在伊德里斯王朝的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实现了利比亚的独立自主,为其国家认同建构增添了革命热情。然而,卡扎菲建构国家内核的两种思想资源,即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部落政治文化,存在内在张力。卡扎菲意图效仿阿拉伯民族“黄金时代”的故事,通过对外斗争增强民族自豪感,同时借助部落纽带团结利比亚社会。但是利比亚的客观国力不支持卡扎菲实现其梦想。卡扎菲政权陷入更为激烈的内外矛盾后,为巩固其政治合法性,最终选择挖掘部落政治文化的潜力。这对于建构国家层次的共同体认同造成两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卡扎菲的“强人政治”充满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色彩,并未树立真正的超越部落忠诚边界的国家认同。卡扎菲重塑传统的部落政治文化,并试图使之近似于国家认同,结果反而使利比亚的民族主义思潮庸俗化为变种的部落主义。另一方面,卡扎菲将部落价值体系奉为主臬,实践中通过政治权力和国家资源的再分配拉拢亲近的部落。利比亚社会因此被撕裂为支持卡扎菲政权的部落群体和反对卡扎菲政权的部落群体。可以说,卡扎菲政权牺牲了利比亚国家层次的凝聚力,选择个人领袖崇拜和传统价值观念填充国家内核。这是卡扎菲在中东剧变中快速失去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原因之一。

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失败的国家建构给后卡扎菲时期利比亚国家的重建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

第一,长期去制度化的国家建构使得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缺失一个相对健全的国家制度体系。无论是政府部门、官僚系统、司法体系等国家职能机构,还是警察、军队等国家暴力机关都必须重建。这使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国家建构面临更为复杂的内部矛盾。

第二,中央权威缺失,非国家行为体横行。卡扎菲统治时期利比亚地方高度自治,以家庭、社区和部落为代表的地方共同体几乎主导了本地区的国家治理机制。卡扎菲政权倒台后,利比亚的政治和安全真空强化了地方自治机制。在中央权威衰弱的背景下,部落武装和城市政治兴起,利比亚社会被多个地方“强人”主导的利益集团分裂。^③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自下而上的“再部落化”,并推动部落成为后卡扎菲时期利比亚主要的非国家行为体之一。^④

第三,卡扎菲还留下强大的地方恩庇体系,削弱了利比亚建立强力中央权威的可能性。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国家建构总体上增强而非削弱了传统社会组织在政治参与中的作用。后卡扎菲时期利比亚出现的多重治理危机迫使部分利比亚人转向地方的部落、社区和族裔群体寻求庇护,

① 韩志斌:《中东部落:概念认知、类型演化及社会治理》,载《史学月刊》,2021年第5期。

② 王金岩:《利比亚部落问题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6—57页。

③ 马小东、王广大:《城市政治与利比亚政局的演化逻辑——以米苏拉塔和津坦为中心》,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3年第5期。

④ 章远、於宾强:《利比亚战后政治重建进程中的“再部落化”问题探析》,载《西亚非洲》,2024年第4期。

构成地方割据局面形成的经济、社会基础。利比亚好似又回到了建国初期被迫接受现存恩庇体系维护政权统治的窘境,而这也几乎决定性地塑造了后卡扎菲时期利比亚“弱国家”的开端。^①

四、结 语

国家建构是困扰中东多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普遍难题。中东剧变以来,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埃及等国家发生政治动荡,出现现代化发展倒退的现象。当今中东国家在国家建构过程中面临的多重困难,根源在于外源性的现代国家与本土的传统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看,中东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立足于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历史过程。探寻二者博弈的历史过程,挖掘一国国家建构的独特性并阐释其普遍性,是有助于回答“中东之问”的重要命题。

对于大多数中东国家而言,现代国家诞生之初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规制了一国国家建构的发展和转型方向。利比亚现代国家源于联合国“制造”,传统社会变革相对缓慢,属于典型的“强社会”塑造“弱国家”。在利比亚这一多文明竞逐的战略要地,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享有稳固的社会权力和自治地位,国家的中央权威长期缺失。这不仅塑造了利比亚多元、破碎的社会结构,而且还造成了利比亚现代国家建构要解决的两大核心难题:一是拓展政权基础的社会来源,增强国家的合法性;二是合理配置以石油收入为核心的国家资源,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利比亚自独立以来的两个国家政权都未能解决国家建构的难题。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缺乏系统性的国家建构,其特点是政权长期维持低水平的政治动员,国家制度几乎没有代表性,官僚体系是社会亲属关系的延伸。这导致君主制政权不具备有效的国家治理能力,也没有容纳新兴阶层的空间,丰沛的石油收入反而推动政权更迭。卡扎菲上台后意识到国家建构缺失的危害,曾以革命热情发动广泛的政治动员,试图扫清旧制度,拓展政权的社会基础,却因缺乏政党组织推动革命、遭到部落社会抵制以及爆发领导层内部政变等因素而失败。卡扎菲此后转向巩固个人威权统治,复兴部落政治增强政权基础,挖掘部落政治文化的价值,但未能摆脱中东“强人政治”的窠臼,出现腐败猖獗、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尖锐等问题,最终在中东剧变中政权崩溃。

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域下,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的兴衰,阐释了利比亚“弱国家”治理“强社会”的困局。当“弱国家”需要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增强国家能力、拓展政权社会基础来建构现代国家时,国家政权又必须经受发展了的政治动员衍生的考验,否则政权可能为了维护统治而主动限制国家建构进程,转而向传统社会妥协,融入既得利益集团,逐渐失去改革能力和治理能力。这是一个同时兼顾的历史进程又是对国家政权自我革新能力的考验,对于利比亚这一基础薄弱的第三世界国家构成了长期存在的结构性挑战。正如丽萨·安德森所言:“利比亚人经常谈到近些年的历史给他们带来的眩晕感……从赤贫到暴富,从保守的君主政体到激进的革命……许多受过教育的利比亚人承认,这扰乱了他们对自己国家应该是什么样的认识,破坏了对未来进行筹划和投资的努力,造成了一种犬儒主义和疏离感。”^②

因此,利比亚国家建构存在鲜明的悖论。一方面,利比亚国家政权在石油经济的支撑下,借助非正式制度和以部落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维护统治,但极易造成腐败猖獗、制度失灵,损害国家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利比亚弱势的国家治理始终未能深度渗入多元、破碎的社会肌理中,缺失有效政治动员的国家也不足以改变利比亚社会长期自组织、自治理的传统模式,这就迫使国家政权更为依

^① Jean Louis and Romanet Perroux, “The Deep Roots of Libya’s Security Fragmentatio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55, no. 2, 2019, pp. 201, 213.

^② Lisa Anderson, “Libya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36, no. 4, 1982, pp. 533–534.

赖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一旦利比亚国家政权试图突破这种“强社会”对抗“弱国家”的困局,就必然要在缺乏足够社会基础的前提下,竭力缓和增强国家能力与保障政权安全之间的张力。利比亚国家建构破局的关键在于:建立拥有坚实基础的中心权威,在深入基层的政治动员中逐渐取代地方“强人”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并达成统一战线,同时国家政权在这个过程中经受住考验,实现自我革新。总之,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驱逐了西方殖民者在利比亚的遗留影响,收回了石油主权,践行了独特的政治实验,在利比亚历史进程中留下浓重一笔。尽管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建构失败了,但仍对利比亚国家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强社会”对抗“弱国家”的国家形态底色,利比亚距离实现长治久安的国家建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Abstract A diverse and fractured tribal society and a weak new nation-state have shaped Libya's typical political and social structure featuring "strong society vs. weak state".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strong society" and "weak state" has become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slamic socialist state in Libya. The Senussi monarchy failed to leave a useful historical legac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slamic socialist state in Libya. Gaddafi's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efforts after taking power did not work well, and then he launched a popular revolution. Gaddafi mainly used the means of division and buying over to govern the Libyan tribal society, and tried to build a "strong state" based on the deinstitutionalized Jamahiriya system, authoritarian rule, rentier economy, as well as tribal politics and culture, which eventually ended in failure.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failure of Libya's Islamic socialist state construction is that the Gaddafi regime failed to break the dilemma of "weak state" governing "strong society", but exacerbated the conflict between "strong society" and "weak state" instead. In this sense, Libya has a long way to go to achieve long-term and stable state-building, as it is in a situation where a "strong society" confronts a "weak state".

Keywords Libya Islamic Socialism State-Building Strong Society Weak State

(韩志斌,教授;谢宇科,博士研究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西安,710068)

[责任编辑:于红]